



日清 战争

著者 生

K264
5
2

日 清 战 争

〔日〕藤村道生著

米 庆 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827396

日 清 战 争

——東アジア近代史の転換点——

藤村道生著

根据日本岩波书店 1974 年 2 月第二版译出

日 清 战 争

〔日〕藤村道生著

· 米 庆 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1,000

1981 年 3 月第 1 版 198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0 册

书号：5188·11 定价：(六)0.54 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日清战争》一书，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发行的。译文据一九七四年第二版。

作者藤村道生是日本九州工业大学教授，专研日本近代史，著有《山县有朋》、《日本外交史》(合著)、《日俄战争史研究》(合著)和其它论文多篇。

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概述。书中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的形成等问题作了较为客观的分析。特别在战争的起因和责任问题上，论证了日本的目的在于取得对朝鲜的统治权，它从一八八二年便已开始准备对华发动战争，从而说明了日本首先揭开战争序幕的事实。

本书对战争的国际背景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指出这场战争第一次反映了英俄两国在东亚的矛盾，而英国又是默认日本对华发动战争的，指明了战争的实质是国际资本主义侵略远东的一环。另外，作者所提出的构成这场战争的三种局势，也引起了日本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当然，书中对某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也还存在着有待商榷的地方。

为了尽量保持原著的面貌，书名照译为《日清战争》，并保留了书中所提到的“清国”等字样。书中涉及当时清政府的活动和其它有关我国方面的情况，所引用的资料均系译自日文，有的未及查对出处。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出版社和周围同志的协助，特此致谢。由于译者的水平有限，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目 录

序言	1
一 序章——日本军国主义和东亚	7
1 日本对朝鲜的扩张	7
2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	19
3 日本资本主义与大陆	25
4 日清战争前夕的民众生活	29
二 以日清开战为中心的东亚形势	35
1 甲午农民战争	35
2 朝鲜问题与列强	41
3 甲午农民战争与日本	45
三 陆奥外交	53
1 日清两国的出兵	53
2 第一次绝交书	62
3 第二次绝交书	72
四 战争的经过和对朝鲜政策的开展	82
1 开始战争	82
2 战争的领导	93
3 压制朝鲜	102
五 侵入清国的领土	113
1 辽东半岛的战斗	113
2 对朝鲜政策的矛盾	120
3 接近媾和与战争局势	128
4 媾和问题的进展	135

六 《马关条约》与三国干涉	141
1 马关媾和会议	141
2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各国的动向	146
3 三国干涉	153
七 占领台湾与战后经营	166
1 朝鲜政策的倒退与挫折	166
2 占领台湾与台湾的抗日武装斗争	173
3 归还辽东和重新签订日清条约	181
4 战后经营	185
八 结论——日清战争的历史意义	194
日清战争简略年表	207

序 言

从日清战争开始到一九七四年，已经有八十年了。日清战争是日本从“被压迫国”向“压迫国”过渡的转折点，因此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战争，具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匹敌的意义。可是，今天还不能说完全阐明了日清战争，其原因固然是由于下述的研究条件，但最大的原因，则是除了战争的原因极端复杂之外，把直接开战的原因说成是因为朝鲜的内政改革又非常缺乏说服力。胜海舟^①曾论及日清战争为无名之师，明治天皇一直到开战的时候始终是消极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从六月二日得到清国出兵朝鲜的报告，陆奥〔宗光〕外相和川上〔操六〕参谋本部次长秘密决定开战，到七月二十五日由于丰岛海战而实际开战为止，之所以需要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说穿了就是为了寻找直接开战的理由。先决定开战，然后再寻找开战的借口，才是事情的真相，伊藤〔博文〕首相感叹地说过：开战后“不知不觉地就乘船出洋了”。按照尾崎行雄^②的说法，所谓日清战争的举国一致，也是“雷同附和”的结果，不过是因为国民“意志薄弱、行为怯懦”，“完全抛弃了平生的学识、信仰、利害和感情而已”（《太阳》，一八九五年六月）。

此外，日清战争在军事方面虽然压倒了清国，但从政治上

① 胜海舟(1823—1899)，原为德川幕府时期的“旗本”(幕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就任海军大辅(次长)。受封伯爵，曾任枢密院顾问。著有《开国起源》、《海军历史》、《吹尘录》等。——译者

② 尾崎行雄(1859—1954)，日本政治家。曾任《新潟新闻》主笔，大隈内阁时期的司法大臣。一八八二年参与成立立宪改进党。——译者

来说,却是一次失败了战争。这是因为战争导致了三国干涉,没有达到朝鲜改革这一战争目的,即没有实现朝鲜的殖民地化。日清战争是中国被正式分割的起点,是在亚洲形成帝国主义体制的分水岭,同时将俄国引入了朝鲜,从而使日本失去了大部分战争目的。所剩下的,仅仅是对朝鲜和台湾民众的压抑和奴化。因此,从亚洲民族的立场上来说,日清战争只能是一次应该痛惜的战争。

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曾试图明确日清战争的真相,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被严格禁止了。在战后,虽获得了研究的自由,但对有关日清战争的研究,也是不充分的。总结性地讲,这是因为日清战争有三种局势,这三种局势的重叠,构成了日清战争的形态,只提出其中的任何一种局势来分析,是不能清楚地明了日清战争的真相的。

日清战争的第一种局势,是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对远东的分割,而事先以压制朝鲜为目的,想排除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在这一方面,〔日本〕和清国的武装斗争就成为主要手段。通常只是把这种局势理解为日清战争。第二种局势是〔日本〕围绕着分割中国和朝鲜的问题而与列强竞争的局势,所谓陆奥外交正是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局势而执行的政策。第三种局势是以旅顺屠杀事件为象征的出兵和对占领区民众进行压制的局势,这种局势反映了战争的政治侧面。

第一种局势否定了华夷秩序,废除了日清两国相互享有领事裁判权的状况,并最终决定了琉球的归属问题。日清战争中的国民战争的成分,只有在这种局势中才稍微存在一点。第一种局势的问题所在,是两国的最高战争领导都存在二元化问题。在日本,为统帅权的独立所支撑的军事侵蚀了政治,

战略观点压倒了政治策略观点。而在清国，也有后党(西太后、李鸿章)和帝党(光绪皇帝、翁同龢)之间的对立，双方二元化的对立，使开战与媾和的过程复杂化了。

第二种局势的问题所在，是由于发生战争时，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正处于开始形成的特殊时代，世界政治虽然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而基本上被规定下来了，但由于运输、通讯等手段的不发达，所以帝国主义还不能完全控制整个世界。结果，日清战争可以说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在列强的注视之下，日清这两个帝国主义候补国家，面临着或是向帝国主义转化、或是沦落为附属国这样一种竞争性的战争。一般地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小国”之间的开战或媾和，与其说是由当事国自主决定的，不如说为包围着它们的“大国”的意志所左右，这种倾向很严重。日清战争也不例外，开战理由的变化正是由于对大国干涉的顾虑。当年被称为陆奥外交的日本外交，就是在英、俄的对立中依靠英国、过分信赖英国的援助来促成军事上的成功，并着手分割中国的。针对日本的这种企图，本国资本主义落后、但却把满洲^①当作排他性市场的俄国，以武力为后盾转向了真正的干涉。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干涉是一次没有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日本所期待的英国从基本上来说是要求维持东亚的现状，所以拒绝援助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于是日本在俄国、德国和法国的三国干涉下不战而败了。

第三种局势几乎历来就没有被注意过，但它象日清战争从出兵镇压朝鲜反侵略、反封建的甲午农民战争开始，以镇压台湾的抗日义兵斗争^②而结束那样，明显地支配了战争的全

① 指我国东北。——译者

② 义兵斗争或义兵运动是指被侵略、被压迫国家的正义斗争。——译者

过程。

当时的民众主要是把第一种局势理解为日清战争，所以历来潜在的对清的恐怖感，一举变成了对清国的蔑视，并沉醉于对清国取得的军事胜利。另外，军部虽然注意了第一种局势和第三种局势，渴望分割中国和统治朝鲜，但却忽视了俄国武装干涉的危险。三国干涉之前，征清大总督府忽视本土防卫而大举出征，就是这种情况的例证。重视第二种局势，并苦心设法调和第一种局势所产生的后果的，几乎只有伊藤首相和陆奥外相，《蹇蹇录》中记述了这样的苦心忧虑：对于不理解第二种局势或者表示不理解第二种局势的军部和“舆论”进行诱导，并努力“使祸害迟一天爆发”，想表明“当时何人当此局势亦决无他策”的心境。

日清战争正式结束以后，政府当局只讲第一种局势，而把第二种、第三种局势从民众的心目中抹掉。这是因为战争虽然在军事上胜利了，但在外交上却是失败了，而且在政治上问题还没有结束。政府当局把外交上的失败归结为国力不足，并且把第三种局势称为“匪乱”而加以蔑视。这在日清战争的研究史中也有反映。比如作为日清战争正史的、由参谋本部公开发行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以及由军令部刊行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等，都只讲了军事上的一个侧面。叙述第二种局势，并想明确弄清其失败原因的《蹇蹇录》，好容易见到阳光，那已是一九二九年的事情了，它从脱稿之后已经过了三十四年时间。

以陆奥宗光的叙述为经，以俄国除外的各国外交史料为纬，最先开始研究日清战争的开战过程的，是信夫清三郎。然而他的著述《日清战争》（一九三四年）遭到禁止发行。其理由

是说它明确地揭示了日清战争的真相，会激励朝鲜和中国的抗日运动。同样，田保桥洁的大作《近代日朝关系之研究》（一九四〇年）也不许公开发行，只是作为朝鲜总督府的外部秘密资料来刊行的。而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为了不给禁止发行以借口的苦心之作——《日清战役外交史的研究》（一九四四年脱稿）也不幸象遗稿一样被搁置起来，到了一九五一年才好不容易地通过朋友之手刊行出来。正如书名所表示的那样，主要是探讨第二种局势，叙述到《马关条约》的批准为止，对三国干涉和台湾的占领与抗日运动略而未谈。

在战后的研究中，有中塚明所著的《日清战争之研究》（一九六八年）。它主要是研究了陆奥宗光文书，并探讨了铁路电讯条约、清国宝物搜集法等内容，明确了战争的侵略性。但因为在叙述上没有采取通史的结构，所以不仅没有勾划出日清战争的全貌，而且因为只是依靠日本方面的资料来进行研究的，所以也没有明确日本的政策是怎样在对付中国、朝鲜和列强的过程中执行的。其中，日清战争的复杂性被简单化了，因此没有明确日清战争在日本近代史上，以及在东亚和世界史上所具有的意义。

我在一九七〇年纪念信夫〔清三郎〕教授六十花甲的时候，增补了前面所提到的信夫清三郎所著《日清战争》一书中的空白之处，并加以详细的补充注释，使之重新发行。对开战外交过程有兴趣的人，务希参阅上述各书所研究的内容。

本书虽是一本小册子，但是把“应该痛惜的战争”——由于亚洲近邻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引起了近代帝国主义竞相分割整个亚洲，并使日本民众本身也开始受到本国帝国主义化政府的束缚——放在东亚的历史上加以综合性地进行考察，这

恐怕还是第一次。本书是在纪念日清战争八十周年，祈求实现东亚各民族真正友好的心情下写成的，如果对此稍有补益也是我的幸运。

另外，关于日清战争的基本资料，日本方面的，引用了日本外交文书、陆奥宗光文书、伊藤(博文)家文书，以及陆奥外相自己写的《蹇蹇录》等；中国方面的，引用了《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李文忠公全集》；朝鲜方面的，引用了《李朝高宗实录》、旧韩国外交文件等等。除此以外，还引用了俄国、美国、英国和德国所分别公开发行的外交文件。但考虑本书的性质，所引用的资料，除部分外，其余一概不注明出处。

本书献给名古屋大学时的恩师下村富士男先生的在天之灵。

本书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结论，与过去老师同我共同所下的结论不同。然而象我常常提出异议那样，虽然老师也许加以严厉批评，但相信老师对我已经得出自己的结论也会感到高兴的。我没有在老师生前写出本书，甚为遗憾，但总算将本书献给黄泉之下的老师，以祈冥福。

最后，对经常以丰富的学识和周密的讨论，为本书丰富了内容的日本外交史研究会的各位先生(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谷川荣彦、冈本宏、安部博纯、毛利敏彦、石川捷治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藤村道生 一九七三年七月

一 序章——日本军国主义和东亚

1 日本对朝鲜的扩张

壬午兵乱

一八八二年七月，在朝鲜首都汉城发生了士兵的叛乱。民众和叛乱的士兵相汇合，杀死了日本军事教官，袭击了日本的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等前往仁川避难，被英轮搭救逃回日本。这一事件被称为壬午兵乱，然而〔朝鲜〕民众和士兵联合起来使之发展为大规模的反日暴动，却不是偶然的。

日本从一八七六年缔结了《日朝友好条约》^①以后，不断向朝鲜扩张。一八七七年在釜山、一八八〇年在元山分别设置了特别居留地，这种居留地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在这些居留地内，除了日本人外，不准租借土地，而且居留地内的行政权要由日本政府的代表来行使，并掌握适用日本法律的警察权，这种居留地跟以往西欧各国在中国所设立的任何租界相比较，其侵犯主权的程度都更为严重，几乎是日本领土的延伸。扩张到居留地的协同商会和大仓公司、三菱公司等利用免除进口税的特权，向朝鲜出口西洋纺织品和火柴一类的日用品，大量换取白铜货币和叶钱等朝鲜货币。它们还利用朝鲜

^① 该条约因在朝鲜江华府签订，故又称《江华条约》。——译者

方面在条约上没有裁判权的便利条件，不断地违法乱纪，进行投机性的商业活动，从而破坏了朝鲜的经济，使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因为日本商人对谷物进行囤积性的抢购，使〔朝鲜〕米、麦价格暴涨到二至三倍，甚至出现了粮食储备一空的地方。因此，民众对于日本商人的横征暴敛感到极为气愤。一八八二年三月，大仓公司的职员儿玉朝二郎和三菱公司的职员大渊吉威等无视条约的规定，擅自来到了元山居留地以外的安边，受到了激愤的民众的袭击，发生了同行僧侣莲元宪诚当即身死、儿玉朝二郎和大渊吉威身负重伤的事件。对此，福泽谕吉^①在《时事新报》（四月二十五日）上发表评论，极力主张立即向朝鲜的通商港口派出军舰，以保护侨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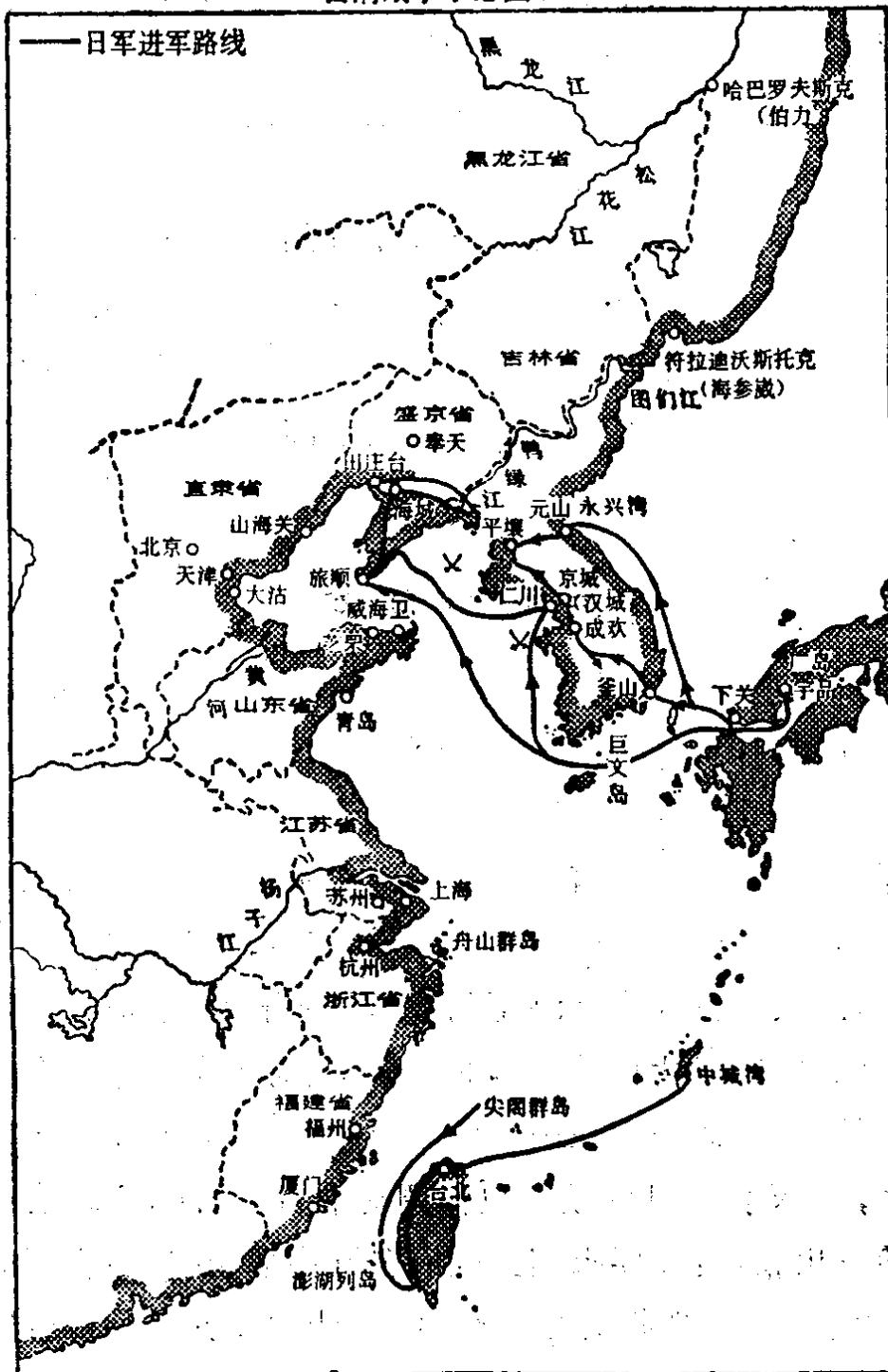
当时，日本正在进行着一种以收回关税主权和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为目标的修改条约活动。但是，就连进行这一活动的中心——自由民权派也认为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是理所当然的。日本为了达到修改条约的目的，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是不利的。正如一八八一年十月驻英公使森有礼向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②提出领事裁判权的存在有损于独立国家的主权时，格兰维尔所反驳的那样：日本政府本身不也是在日朝条约中承认领事裁判权不同于司法制度，是必要的，并不否定独立主权的原则吗？可是，自由民权派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日本对朝鲜的扩张，并不只限于商业活动。日本还派遣

① 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思想家、教育家。著有《文明论概略》、《劝学篇》、《西洋事情》等书多种，在日本有相当影响。——译者

② 格兰维尔(Granville, 1815—1891)，于一八七〇至一八七四年；一八八〇至一八八五年两次就任英国外交大臣。——译者

日清战争示意图



(按原图译制)

了军事教官,着手建设日本式的军队,并要求租借釜山港外的绝影岛作为〔日本〕舰队基地。日本的高压态度加强了朝鲜的反日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儒生们所主张的“卫正斥邪论”(即保卫朱子学的教诲,排斥西洋邪说)的影响扩大了。国王的生父、对国王外戚闵氏一派夺取政权不满的大院君李昱应则联络儒生,并教唆和煽动那些担心日本式军队夺去自己地位的旧式军队。于是,七月二十三日士兵起义,在亚洲第一次形成了反日暴动。大院君进驻宫廷,驱逐了闵氏一派并掌握了政权。

兵 乱 与 日 本

朝鲜发生变乱的消息一传到日本,日本政府便在七月三十日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萨派的首脑黑田清隆主张迅速派遣讨伐之师,立即开战。而重视列强意向的外务卿井上馨则要求先派出舰队,在军事压力的基础上进行谈判,视谈判成败再研究出兵问题。会议采纳了井上的意见,首先派出了一个大队的陆军、一百五十名海军陆战队和四艘军舰。但在八月一日,山县有朋却以代理陆军卿的资格,调动了东京和熊本两个镇台^①的兵力,命令在福冈编成混成旅团,同时又命令运输船只待命,后又指令其它镇台也作调动准备。〔日本〕政府向花房公使发出指示:除要求朝鲜政府公开谢罪、抚恤被害者的家属、惩办犯人、补偿损失和赔偿出兵费用外,并在朝鲜政府负

① 镇台是日本的军政机构,以团、队为基本编制,配备各种兵种。一八七一年八月设有东京、大阪、镇西、东北等四个镇台,第二年一月重新改制为仙台、东京、名古屋、大阪、广岛和熊本等六个镇台。至一八八八年改为师团。
——译者

有责任的情况下，还要求割让对马海峡的要地巨济岛或海参崴对面的郁陵岛。并训令，如果朝鲜不答应，则对仁川进行保障性占领。

报刊的论调和政府的强硬方针是一致的。自由党的机关报《自由新闻》(八月二日)说：“如不显示我之兵威，夺其志士之心胆”，那么在朝鲜就不能取得“和平之进展”，所以“外示开战之势、内求和平谈判”是为上策。这样一来，虽没有要求立即开战，但是自由党的党员奥宫健之却煽动说：“欲使我国人民知晓扩张国权与爱国之重要，宜速发起问罪之师，轰动国威于海外”(《自由新闻》八月四日)。福泽谕吉也说：“终须迫至城下之盟”(八月一日《时事新报》)。

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政府完成了混成旅团的编制后，就指示要一举解决开放咸兴、大邱、杨花津以及承认外交官前往内地的旅行权等以往外交上的悬案。日本为了对外战争而动员军队，这是第一次，它表明日本军队的基本任务，已从镇压内战转向了对外战争。

获得在朝鲜的驻兵权

清国害怕由于日本的出兵而动摇它对朝鲜的宗主权，就紧急派出了三艘军舰和三千名陆军。当调查结果，得知为大院君所主谋，于是为了防止日本逮捕大院君，并为达到提高清国权威的双重目的，将大院君幽禁在清国的保定。在日本和朝鲜的谈判中，清国也积极地介入了，从而阻止了日本割让土地的要求，并使之缔结了《济物浦条约》和《日朝友好条约续约》。在《济物浦条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包括了一年以后撤兵的内容，但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获得了〔在